

重慶·一個

內陸城市的崛起

CHONGQING
THE RISE OF
AN INLAND TOWN
**Chong
qing**

周 勇主編
重慶出版社



重慶 ● 一個 內陸城市的崛起

● 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編

● 周勇主編 ● 重慶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何鸿钧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聂丹英

周 勇 主编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插页11 字数414千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1187-0/K·66

（精装）定价：9.60元



主 编

周 勇

撰写人(按章节顺序排列)

胡道修——第一、七章

周 勇——第二、三、四章

饶 亚——第五章

朱培麟——第六章

陈建智——第八章

余 凡——第九章

谷明宇——第十章

第十一章由胡道修、陈建智、
谷明宇合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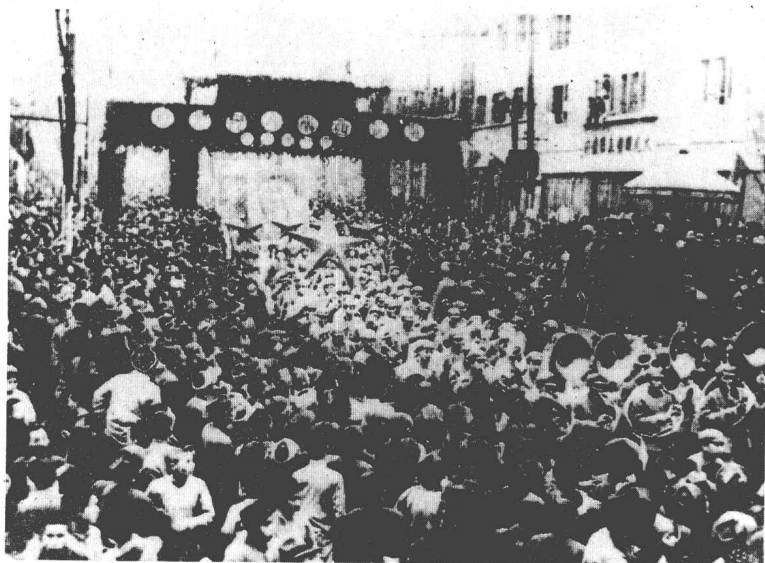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重庆合影（1950年）。



1952年7月1日，重庆各界在菜园坝车站隆重举行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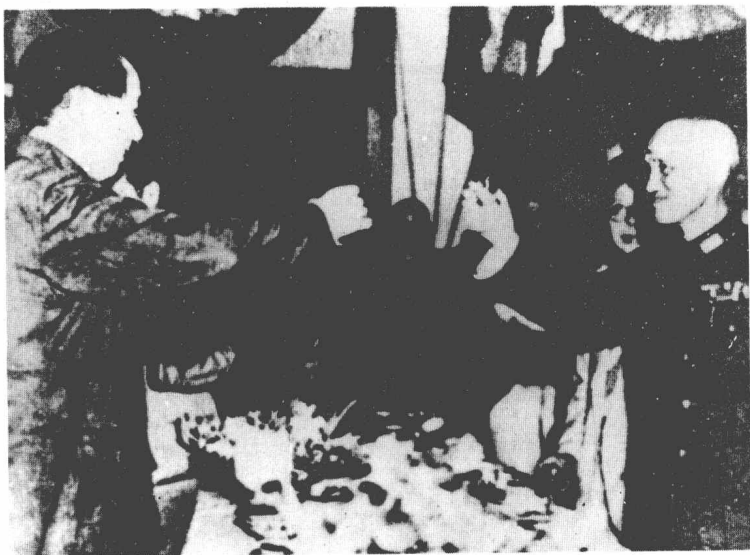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



1950年1月1日，重庆各界举行庆祝解放的盛大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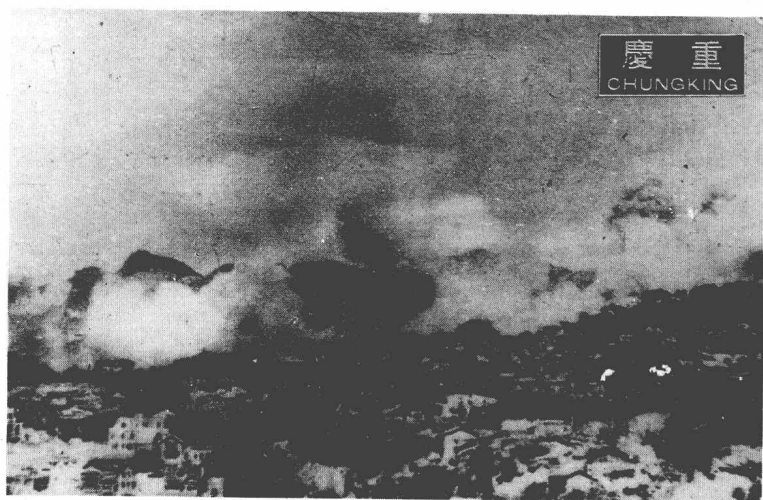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1939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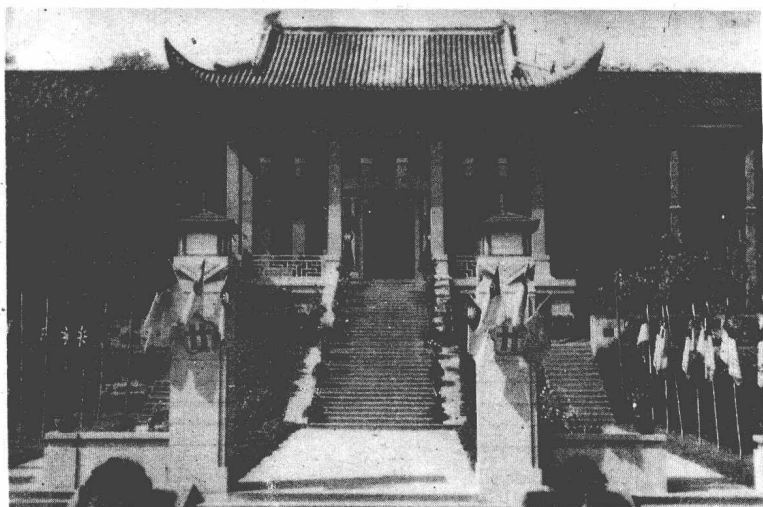
1945年8—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招待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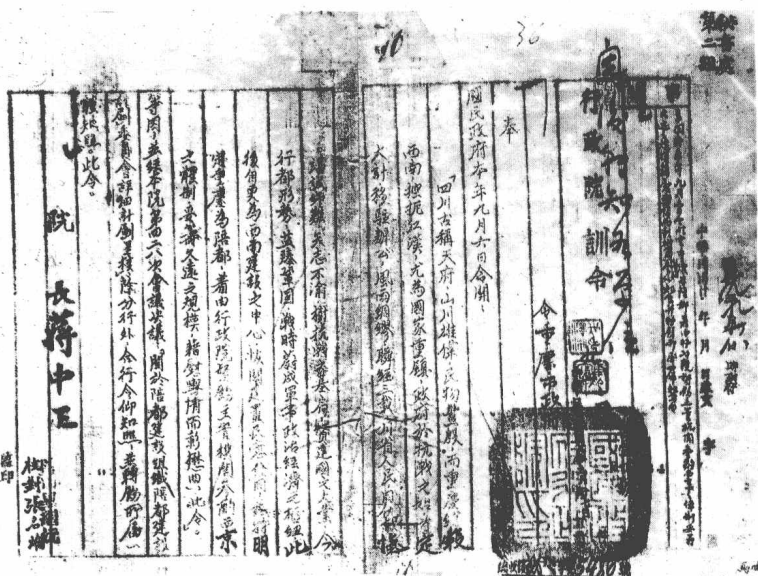
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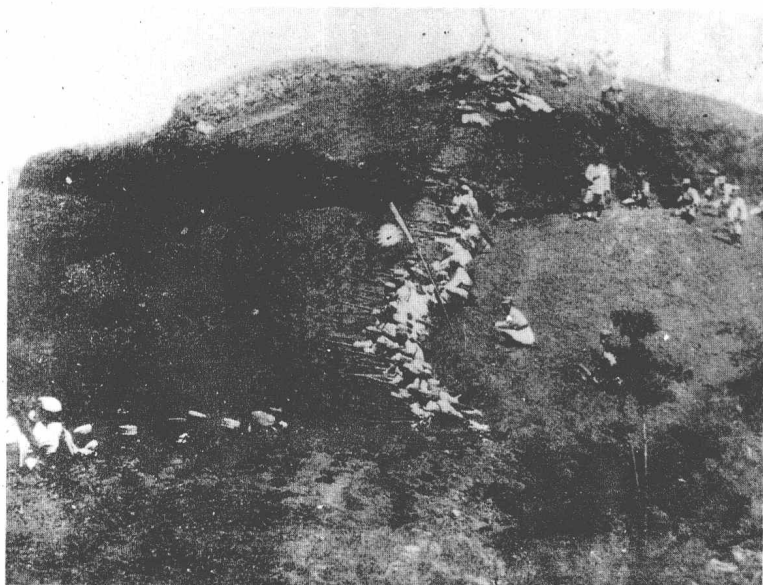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图为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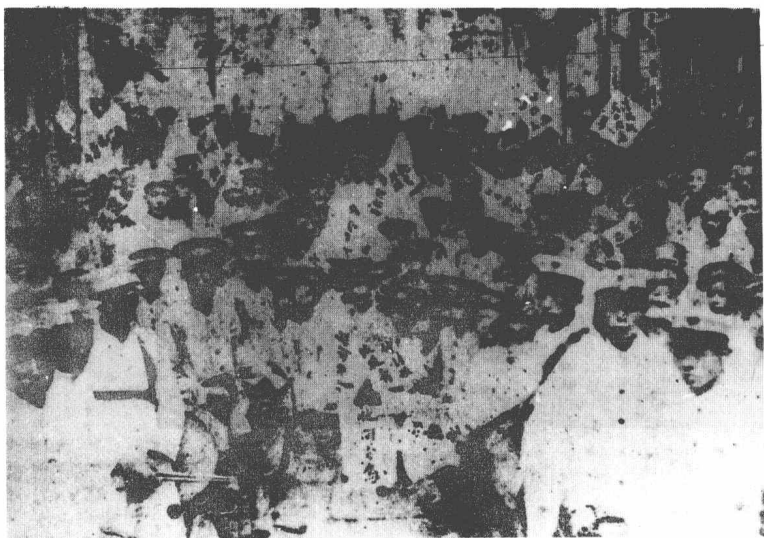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图为行政院定都训令。



在1932—1933年的“二刘之战”中，刘湘军与刘文辉军对垒。



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部分成员合影（1937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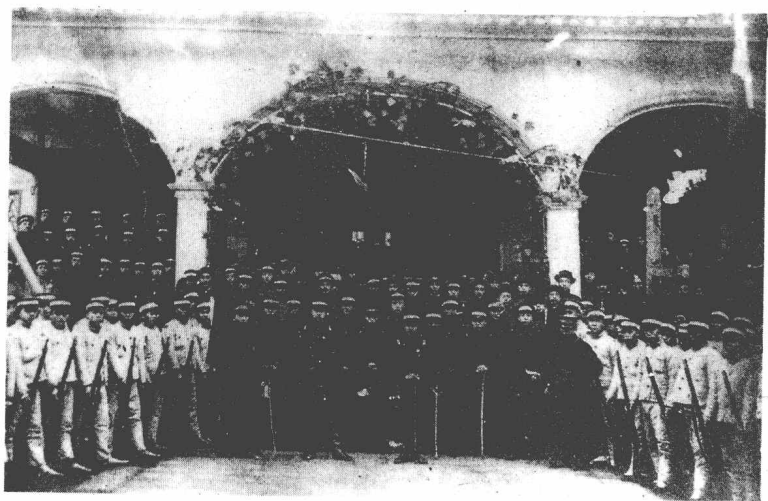
1919年6月，重庆及川东学生救国团3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



重庆地方党团组织负责人合影（1925年春，第二排左起：杨闇公、肖楚女、廖划平；后排左一张朝宜、左四罗世文、左五彭兴道、左六张锡畴）。



大足县龙水镇天主堂。



重庆蜀军政府成员合影（1911年）。

中英《烟台条约》
续增专条》规定重庆
开埠（1890年）。

慶爲通商口岸并准以華船載運定約約凡六條是

煙臺條約續增專條

大清
大英國國家爲續議條款事前因光緒二年煙臺會
議條款第三端通商事務第一節內載四川重慶
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
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居住開設行棧俟
輪船能上駛後再行議辦等語嗣因彼此意見不
同未克定議今願合衷商辦以歸一是故擬定續

增專條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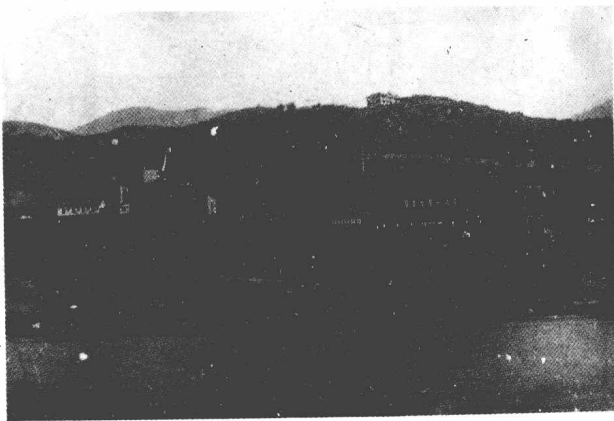
一重慶即准作爲通商口岸無異英商自宜昌至重
慶往來運貨或僱用華船自備華式之船均聽其
便

一此等船隻自宜昌至重慶往來裝載運貨與輪船
自上海赴宜昌往來所載之貨無異即照條約稅

則及長江統共章程一律辦理

一凡此等船隻所執船旗號應領貨照及擬運宜昌
以上貨物如何折動另裝並宜昌至重慶貿易之
人應遵守一切規則俾得獲得保護利便之益應由

宜昌關監督及現駐重慶之川東道暨稅務司與
英國領事官會商安章程其所定之章日後有



重庆海关（1891年）。



巴国青铜剑（巴县冬笋坝出土）。



明代合川钓鱼城护国寺大门。

序 言

孟 广 涵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近百年来，它从一个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的区域军政中心，发展成为今天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国际性名城。由于重庆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发挥的特殊作用，不论是过去的重庆历史还是今天的重庆现实，都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给当代中国以巨大的影响。

在庆祝重庆定名800周年，建市60周年，解放40周年之际，由一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撰写的第一部重庆通史——《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终于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它是我们了解重庆历史的指南，研究重庆历史的门径，宣传重庆的教材。特别是为我们探讨重庆城市发展规律，规划重庆实现现代化的蓝图提供了反思的历史线索和借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地方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带有区域特殊性的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重庆地方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揭示以重庆为中心的区域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研究重庆这座近代城市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出版和发表了4 000多篇（部）重庆地方史论著。由于其对象的区域性和特殊性，它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从而推动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在社会生活中，它使我们深入系统地认识市情，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刻准确地认识省情和国情，推进重庆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重庆市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作用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表彰。

近十年来，在我国，区域地方史研究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这一领域，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论著，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地方史硕士研究生。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包括重庆在内的近代城市史（其它为上海、天津、武汉）、近代区域农村史（华北、华南、长江中下游、江南），以及香港史研究，首次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还资助了包括四川通史在内的区域地方史课题。台湾学者也正在开展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中国地方史研究已走出了困境，形成了高潮。

在国际上，中国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也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国际学术潮流，美国、日本等国收藏了我国大量的地方史著作和资料。地方史研究的课题也十分广泛，凡地方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军事、民情尽在其中。在研究方法上也日趋多样化，有对一个县的微观研究；有对各大区域社会结构、框架的宏观研究；有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区域性、社会性研究，等等。研究者中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外国研究生选取中国地方史（包括四川史、重庆史）作为博士论文题材。外国学者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助于中外学术的交流与合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是国家“七五”期间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可以说，它是在我国人民进行历史反思，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地方史研究成为一股国际性学术潮流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因此，它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学术著作。

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上，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观点，把它作为研究重庆历史的途径和起点。同时又坚持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的观点。在阐述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时，尤其注意重庆历史的特殊性，始终把重庆放在中国西部的全局地位上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规律。这样就摆脱了地方史只是今日地方行政区范围内的中国通史的缩微版的窠臼。

在内容上，作者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改变了通史主要是政治斗争史的格局，而以重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研究的着眼点。这在该书古代和近代部分的比例和近代史的内容上尤其突出。重庆古代历史悠久，但作者只用一章的篇幅勾划出发展轮廓，而以整整十章来浓墨重彩地论述近代历史。作者既论述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在重庆的反映，又论述了与此相平列的另一线索，即重庆由川东地区封建军政中心，转变为四川、西南、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特别是经济中心的形成演变的过程。这对于中国近代史理论来说，是一种创新，同时，又显示出该书独特的价值。

在历史分期上，作者始终以社会性质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在重庆近代史的分期上独具特色。例如重庆近代史的上限，作者没有套用中国近代史的1840年说，也没有提出一个简单标志，而是从重庆历史出发，把上限处理成一个过程，即1876《烟台条约》——1890《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1重庆开埠。这样就能准确地反映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关于下限，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以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结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重庆》一书的作者也持这一观点，但在处理上又有独到之处。作者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在重庆的结束，毫无疑问，1949年旧政权的崩溃是一个主要标志。但推翻旧政权还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部分，而新民主主义